

◀ (上接9版)

莎、陈力子译,陈淳审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要改变上述现象,加强文化人类学的训练非常必要。

当本文行将截稿时,收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李旻的新作《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这是一本利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探讨早期中国形成及发展的著作。(本书有关内容以《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缩写版形式发表在《考古学报》2017年3期)作者借用南美洲秘鲁古国高地文化与低地文化的发展关系(秘鲁的高地文化和低地文化的发展关系在塞维斯的书中被作为酋邦研究的案例之一),创造出“低地龙山”和“高地龙山”的新概念,构思新颖,写作大胆,有不少富有创意之举。尽管其宏观性的总结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却不失为在探索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的方法上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可见,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探索。

最后,摘引塞维斯在其《序言》中的几段话,或许有助于读者深入领会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重点和结论。

“我认同普遍的准则,将文明兴起等同于国家起源,而国家起源则由基于武力的压迫控制来定义。我一直相信,这一‘国家’的定义能有效适用于一些现代原始社会。

“压迫性武力的国家概念对于定义古代文明不怎么有用。它不能说明文明的起源,也不是判断文明的一个标准。

“本人并不确认普遍认可的将文明等同于城市化的结论。我发现城市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并非必要,甚至并不与其发展紧密关联。

“有关国家是压迫性机构的历来看法是,国家起源与保护和私人财富有关。

“政府的起源基本在于集中领导权的制度化,在其行政管理功能的发展中成长为一种世袭的贵族统治。

“历史上所知诸多的‘原始社会’和六个主要古老文明,都是从酋邦(等级制)社会发展而来的,而酋邦本身是从分节(平等)社会发展而来。”

我相信,随着塞维斯这部大作中文版的面世,将对近些年来中国考古界围绕“社会复杂化”、“文明探源”以及“早期中国”开展的讨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也期待能有更多的人类学译著精品面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 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夏伯嘉教授:

# 在世界的历史中思考中国

采访 狄霞晨

### 海外研究西方历史的中国学人

文汇报:夏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祖籍上海,出生于香港,曾在英、美、德留学,在美国的高校任教,又兼任台湾“中研院”院士。很少有学者有像您这样丰富的跨文化背景,能否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您的教育经历?您最初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后来的专业方向为什么选择了欧洲史?

夏伯嘉:我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是宁波人。我是1955年在香港出生的,那时香港还在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同学中很少有人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的子女。他们大部分都比较实际,希望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学理工科的比较多,对文史比较敏感的还是少数。我从小喜欢看金庸的小说,梁羽生的小说,他们的小说都有中国历史大背景,让我对中国的文学、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中学课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按照英国的制度,像英国文学、历史等课程都是用英文教学的。历史课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的欧洲历史;二是中西交流史,从鸦片战争讲到20世纪。还有两门课是用中文来讲的: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两门历史课在讲到鸦片战争的时候说法是完全相反的:英国历史课本说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的错,因为中国闭关自守,不愿通商;中文的教科书却说鸦片战争代表了英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割据中国,是英国人的错。由此可见,当时香港的教育充满了矛盾,也充满着一种令人思考的刺激。香港本身就是鸦片战争以后才诞生的一个城市,它的历史跟中西文化交流是分割不开的。我出生于香港,可是我的父母亲都不是香港人,所以在这种矛盾的刺激下,我对自己的历史,香港这个城市的历史与整个当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之所以会选择欧洲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从正面来说,小时候,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夏伯嘉教授长年研究欧洲中近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为数不多的海外研究西方历史的中国学人。夏教授精通八国语言,近年来研究兴趣转向中西文化交流史并深有造诣,在世界史的视野中对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提出了新的见解。近日,《文汇报》特约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狄霞晨老师对夏伯嘉教授进行了采访。

父母经常带我去澳门。从香港到澳门坐船才一个多小时,很方便。在这座拥有400多年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的小海港城市里,我看到了有700年历史的葡萄牙建筑物,从而产生了深深的怀古之情,这对我走上对欧洲、西方历史的研究之路是有推动力的。

我虽然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但是当时面对着两大矛盾。一是要了解香港诞生的历史很困难。香港一直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那时候的文化气息比现在还要薄。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在书店看到不少关于香港历史的书,很多也是回归前后出版的。但在我生长的年代,关于香港历史的书基本上不出四五本,其中学术性强的都是英国人写的,但他们却从来不用中文史料。这是我选择读西方历史的原因之一。二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同解释,我刚才提到的对鸦片战争的不同解释就是一个例子。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做一个中国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拿的是英国、香港的护照,但这个护照并不等于英国护照,每一次去英国都是需要签证的。在身份上我没有中国籍,可是在感情上、文化上我是一



个中国人。我不知道要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所以决定先去研究西方文化。

文汇报:您在海外的时间很长,是否也碰到过其他研究西方历史的中国学人?您精通8门学术语言,能否分享一下学习外语的经验?

夏伯嘉:最早的一位是何炳棣先生。他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最早出国的一批人之一,博士论文写的是英国经济史。他在自传里指出他在50年代的美国感受到了种族歧视,特别是学界对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历史的排斥,所以他决定把精力转往中国历史。我在国外碰到的同辈学者中没有中国学者研究西方的;到了八九十年代才开始有年轻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中国学者到了美国,他们的老师往往会劝他们,为什么你们不研究中国本身?研究西方的中国学者在国外往往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力,这跟语言训练也很有关系。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除了英文以外还要学习其他的西方语言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些中国学者本来可能想研究西方,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研究中国更能够发挥中文母语的先

天优势。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需要通过德语与法语,通过以后,很多同学都没有继续学下去。但我出于研究的需要,就去学别的欧洲语言,陆续学了拉丁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语言训练实在不够,所以一直没有放弃要多学语言,这个可能是我苦学语言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

文汇报:您是欧洲史专家,《天主教世界的复兴运动》对欧洲天主教在宗教改革后的复兴运动作出了全面的研究。天主教往往被视为保守的一派,但您却注意到它现代性的一面。如何评价天主教的保守性与先进性?欧洲史的研究基础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何帮助?

夏伯嘉:每一种文明,每一个宗教,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进步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基督教会、天主教教会作为一个历史的现象,当然不能避免受到历史力量的推动,它在不同的时代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中世纪的时候,它曾

(下转11版) ➔